

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

汪 和 建

文章首先解释了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从宏观层次研究开始,逐步下降到中观、微观层次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范式。同时,指出了经济社会关系各分析层次之间所存在的理论控制—经验支持的等级次序结构,以及宏观—中观层次研究和中观—微观层次研究各自具有的天然的“亲和性”。

作者:汪和建,男,1963年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一、引 言

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可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从客观方面看,现实社会中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引起巨大的社会变迁以及经济改革过程受到非经济力量制约的经验事实,要求社会学者建立起一种对现实问题进行经济—社会全方位观察的新思维。从主观方面看,当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都或多或少在学术活动中认识到并力图克服客观社会事物的统一性与理论分析的专业性之间的矛盾。

应该说,在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分化而产生上述矛盾的同时,也就有人力图克服或减轻这种矛盾。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即是对19世纪初以来的处于统治地位的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的“非社会学化”和“数量化”的一种逆向反击。本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新制度学派的复兴以及其他新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都可以看成是对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一种“经济学社会学化”的修补。与之相对应,50年代以来,社会学界也出现了一股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动向,这一动向突破了长期以来社会学假定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特例因而不屑于对之做具体研究的状况,这可以看成是对古典社会学强调研究经济社会关系的一种复归。应该说,在社会学界被称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界被称为“经济学社会学化”的研究在综合研究经济—非经济因素的意图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然而在研究方法上却有着极大的差异。“经济学社会学化”重在引用社会学概念来扩大经济学的认识领域和研究范围,其主要研究方法仍然是正统经济学的方法,例如新制度学派强调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适用性。经济社会学研究也相应引用了一些经济学的概念或理论假定,但所依据的主要研究方法则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决定了经济社会学的目标并非只是修补传统经济学的偏狭,而是要从社会学角度将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有助于较完整地认识和解释综合的经济社会现象。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确定并解释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外,更重要的是要选择和配置适合于该研究对象的社会学

研究方法。与一般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一致,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包括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两个层次。鉴于篇幅限制和研究方法论在研究对象和具体方法之间的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本文拟就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进行探讨。

二、方法论范式

如果说研究对象是确立“研究什么”,那么方法论则是确立“怎样研究”,即方法论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路径或逻辑程序的一种选择。选择不同的分析的逻辑程序,是形成不同的分析思路并建立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因此,经济社会学者在具体研究经济社会关系之前,必须建立一个适当的方法论范式(或研究程序的意向),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分析。

区分研究对象的层次 方法论是为研究对象的分析服务的,因此建构方法论范式必须适应研究对象本身的特质。借助抽象力我们看到经济社会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在内涵上的层次性,即有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之分。宏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是指总体系统水平上的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如马克思(*K. Marx*)所分析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帕森斯(*T. Parsons*)所解释的“经济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中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是指系统水平上的具体经济、社会方面(或因素)之间的关系,韦伯(*M. Weber*)所分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即是在系统水平上从一个方向分析具体的社会方面(新教伦理)对具体的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典范。微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是指不同系统内部的个人或组织水平上的经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韦伯在解释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系统水平命题时,所刻意论证的资本主义精神对合理经济行为的伦理约束即是一种个人水平上的研究。

从宏观层次研究出发 上述三个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都处在经济社会学的视野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完整地研究经济社会关系,应当从哪个层次出发?我的意见是从研究宏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出发。其理由有二:一是经济社会学要全面、完整地把握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就应当首先把“经济”和“社会”作为总体来考察,以便完整地理解“经济”与“社会”各自在整体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分析的科学之处,正是通过总体系统水平的考察揭示了经济系统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的基本的决定性的影响,从而准确描绘了社会变迁的历史总图案。假若从个别关系侧面或局部现象出发则难以达到马克思式的研究效果。二是至今无法否认迪尔凯姆(*E. Durkheim*)的论断: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整体都不是各个分子或个人简单相加的总和。如果这一假定成立,那么,宏观经济社会关系的特征就不能从对简单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直接推论出来。这说明,要理解经济社会关系的总体必须从解释宏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开始,否则就会犯以简单细胞特征去推断整个生物有机体现象这样的错误。

下降到中观层次进行分析 宏观层次的研究具有高屋建瓴的研究视角。但是,由于它远离实际经济社会现象,因而对宏观经济社会关系的把握只能是总体性和高度概括的。其所形成的总体理论和方法固然对低层次的研究有指导意义,但其本身对解释和解决较具体的经济社会关系问题却难以奏效,因此,经济社会关系研究必须引向具体。根据研究对象的层次性,首先应当将研究下降到中观层次,即要对系统水平上的具体经济社会方面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①对经济与文化因素、经济与政治变项、经济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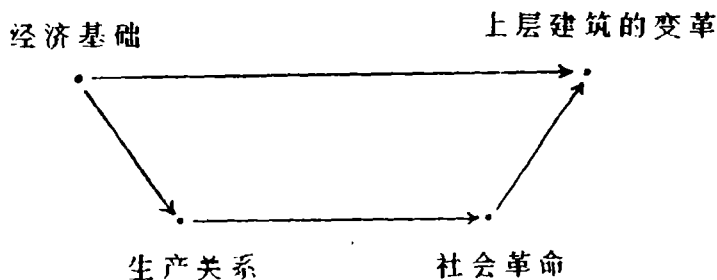
中观层次或系统水平上的分析并非可以任意罗列或进行孤立的研究。系统水平上的分析既受总体系统水平上的分析所形成的思想和方法的控制,同时又是为进一步解释或验证总体

系统水平上的分析服务的。换句话说,系统水平上的分析应当在不脱离总体系统水平的分析的情况下进行。我注意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分析即体现了总体系统水平分析与系统水平分析的有机结合。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集中表达了这样一个宏观命题:经济基础制约和决定着整个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一总体系统水平上的命题显然可以在他称作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等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中得到某些证据。但是,马克思并不寄望于依赖历史学的分析。他选择了下降研究层次的方法,即通过在系统水平上构画三个中观命题,用以支持宏观命题的解释:1. 物质生产力决定着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2. 生产关系一旦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便决定了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的到来;3. 伴随经济基础的变更,社会革命将导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

图1表明了一个宏观中观相结合的命题系统。最上方的水平箭头代表宏观水平的命题。其余三个箭头代表相联的命题:第1个与宏观水平的命题有同样的起点,然后向下达到中观水平;第3个返回中观水平命题的终点。这样,这一命题系统的起点和终点都属宏观水平,而在推理过程中却降到中观水平。

从这一范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宏观层次上的分析对中观层次研究的影响,同时,又能从中得出一个完整的中观层次上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所必须包括的三个具体程序:一是分析宏观层次上的经济或社会制度如何向中观转变;二是分析中观层次上的社会单位如何在特定的经济或社会制度约束下进行活动;三是分析中观层次上的众多社会单位间的互动如何在宏观层次上创造出新的总体系统行为或新的社会情境条件。

图1 宏观和中观命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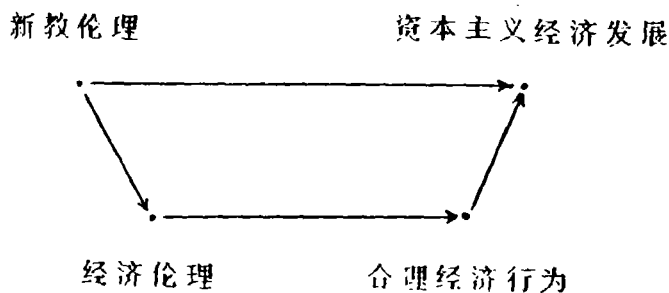
进一步下降至微观层次进行分析 中观层次分析是对宏观层次分析的具体化,然而,从解释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看,该层次的研究仍然存在着某些限制。一是该层次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大,所反映的系统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仍显抽象、笼统。二是存在着淡化个人行为之能动性和影响力的“天性”,因而系统行为的变化过程不易得到可信的解释。三是定量研究中以系统为单位收集资料存在着较大的困难。那么,如何才能避免或弥补中观层次分析的不足呢?办法是继续下降研究层次至最基本的个人或组织水平。在微观层次上进行分析的长处,一是有助于观察和搜集资料。观察单位从抽象的系统下降至具体的个人或组织,便于研究者采用各种调查方法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二是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大多数实际经济社会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应该落实在个人或组织水平。三是有助于对事物变化的预测。用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的行为变化去预测系统行为的变化,比仅用系统“表面”特征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预测,更有可信性和稳定性。四是有助于体现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能动作用。将研究单位从系统下降至个

人,有助于将个人看成是既受社会情境条件制约又能按自己愿望行动的有选择能力的人。根据这种理论假定,社会变迁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将得到更加符合现实的解释。

与中观层次分析相似,微观层次的分析不应该孤立地进行,而应该与高一层次(即中观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进行。借助柯尔曼(J. S. Coleman)的观察,我们发现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微观层次分析与中观层次分析有机结合的典范。韦伯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中观命题: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源泉。为此,他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然而,这一证据并不足以作为该命题的解释性依据。大概是出于这一原因,韦伯下降了研究层次,即试图通过对个人水平上的经济伦理和行为特征的分析来解释系统水平上的现象。韦伯首先审视了体现在新兴中产阶层(以新教徒为主体)身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又在新教加尔文派教义中发现了同样反传统主义的倾向和强调勤奋地恪守天职的训戒,他以此为证据提出,新教伦理提供了资本主义精神生成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经济伦理规范了合理的经济行为,由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研究使其在个人水平上阐发了以下三个微观命题:1. 新教伦理在其信徒中创造了独特的经济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2. 具有这种经济伦理的个人对于经济行为采取了合理的态度;3. 合理经济行为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下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图2表明了一个中观微观相结合的命题系统。最上方的水平箭头代表中观命题。其余三个箭头代表三个相联的微观命题。命题系统的起始和终点都属中观水平,而在推理过程中却降到个人水平。

图2 中观和微观命题: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在这一范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观层次分析对微观层次分析的约束,同时又能从中归纳出一个完整的微观层次经济社会关系的三个程序:一是研究从中观到微观的转变,即解释系统水平上的社会情境条件对个人水平上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二是研究微观水平上的行为,即解释个人或组织如何在外部条件约束下进行行为抉择;三是研究微观到中观的转变,即研究众多个人或组织的行为是如何结合而导致新的系统行为或新的社会情境的产生。

三、结论

我们将上述研究归纳成表1。

表 1

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

研究对象层次	分析的逻辑程序	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
宏观层次 中观层次 微观层次	<p>经济系统 ↔ 社会系统</p> <p>具体经济方面 ↔ 具体社会方面</p> <p>经济制约 行动结合</p> <p>行动结合 社会制约</p>	<p>理论控制</p> <p>理论控制等级</p> <p>经验支持</p> <p>经验支持等级</p>

从表 1 的归纳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1. 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社会关系是分层次的,因此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也必须分层次进行。2. 分层次研究的逻辑程序是,先从宏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研究开始,逐步下降到中观、微观层次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研究。3. 各层次研究之间存在着理论控制—经验支持的等级次序结构。在理论方法方面,高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控制着低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如宏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控制和规定着中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中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控制和规定着微观层次经济社会关系分析。反过来,从经验事实方面看,层序中每一个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都在为更高一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提供必不可少的经验事实,即微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为中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研究提供必要的经验事实,而中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又为宏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提供必要的经验事实。可见,各层次研究之间存在着理论方法和经验事实之间的交换和互补。4. 从研究程序的逻辑和已有的研究情况看,宏观—中观层次研究以及中观—微观层次研究各有着天然的“亲和性”。造成这一“亲和性”的原因大概是它们在相互交换理论控制和经验支持方面的需求性和互赖性更强。假如这一考察符合研究规律并更能反映现实的话,那么,我们在建立宏观经济社会学时就应注意将宏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研究与中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建构微观经济社会学时,要把微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研究与中观层次的经济社会关系研究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唐 军